

延安整风运动经验初探

何 天 齐

蜚声中外的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国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运动。五四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开了道路,在思想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而开辟了我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延安整风运动则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识并掌握了此种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从而达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保证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在今天新的历史时期,重温延安整风运动取得巨大成功的经验,从中吸取教益,对于搞好党的建设和当前正在开展的全面整党是很有意义的。

从党的成立到延安整风的二十年间,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犯过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的严重错误,其中尤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的时间最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由于教条主义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利用了党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和广大党员对马列主义还知之不多的状况,因而很有市场。我们党同教条主义的斗争可说是党内斗争中时间最长也是最困难的斗争。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虽然从军事和组织上解决了问题,但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政治和思想路线上解决教条主义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新的投降主义,并且一度在党中央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投降主义、撤销了长江局以后,王明仍然身兼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多种职务,他的一套仍有相当的影响,当时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就是其突出表现。另外,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了党,党员数量由1937年的4万发展到1940年的80万,增加了20倍,这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就使王明的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在党内得到滋长的土壤,严重地影响和干扰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执行。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向根据地大举进攻,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和解放区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得1941年至1942年成为我党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是克服困难,将革命推向前进的关键,而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又是实

现党的团结的根本一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指挥部。党要引导革命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党的一切活动中，政治路线起着核心的关键的作用。我党在抗日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活动和方针政策，都是围绕着这条路线、有利于它的实现的。王明搞教条主义，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而是形成了路线，它对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最根本最直接最现实的是他那条先是“左”倾机会主义、后是右倾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因此，清算王明的错误，理所当然是要清算他的政治路线错误，延安整风归根结蒂也就是为了彻底纠正王明的路线错误，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排除它对于正确路线的干扰和破坏。

但是，我党的历史经验表明，解决政治原则问题，纠正路线错误，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只是就事论事，只限于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更不能只是单纯地进行组织纪律上的处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歧根源于思想，政治路线的分歧，归根到底是思想路线的分歧，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分清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不可能很好解决的。我党对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和以后的几次左倾错误，都解决得不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是就事论事，单纯地从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上进行处理，而没有或者没有条件从根本思想上解决问题，因而就不能很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尔后又一再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

鉴于历史的教训，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早在1929年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提出了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达到政治上团结一致的光辉思想。为了从思想理论上彻底清算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毛泽东同志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从事巨大的理论工作，先后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从哲学的高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在《实践论》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一切右的和“左”的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指出了从根本上克服错误的途径，从而为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和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把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具体化为一个著名的公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且用“实事求是”这一通俗的中国语言加以表述，使之成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但是，如历史所表明的，一个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开始往往只为个别人或少数人所认识，要使它发挥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就必须把它变成多数人的认识。就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夕，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同志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的指示》的文件（即《毛泽东选集》中的《论政策》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王明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犯的主要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在中央传阅和讨论这个文件时，有些负责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而是从团结全党出发，顾全大局，把这个正确的提法删去了。这当然不是说毛泽东同志否定了自己的正确看法，而是表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和远见卓识。他这时考虑的是，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不能在个别问题上纠缠，而必须从根本上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使全党认识和掌握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和思

想路线。于是就找到了整风运动这样一个好形式。

延安整风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问题的学习，这是为全党整风作准备的，所以又可叫做准备阶段。第二阶段就是全党普遍整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最长（一年零八个月），主要任务就是全党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方法是先精读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以文件的精神为武器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全部历史，开展自我批评和批评，最后由个人和单位作出整风学习总结。第三阶段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又叫高级干部整风总结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在全党整风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后，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特别是王明的教条主义，进行彻底的清算，并作出正式的结论，以达到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三个阶段中无论哪一个阶段，中心都是解决思想问题，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②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指导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中，从根本理论上深刻地批判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和作为它的表现的宗派主义、党八股作风，揭露了它的社会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指出了它的危害性和克服的办法；同时，又精辟地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澄清了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的糊涂思想，指出这个问题不弄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③他在延安时期同许多高级干部的谈话中一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解决主观和客观一致、认识和实践结合这个根本问题。他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号召：“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延安整风运动，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明它的精神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的运动。当然这种宣传和学习，不是停留在理论上，而是通过深刻地检查思想和工作、学习党的历史和路线、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开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来弄清根本问题。为了从根本思想上解决问题，把辩证唯物论的根本原理贯彻到实际工作和行动中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和指示，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等，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就起了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说：“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④这个“根本”就是世界观、方法论，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从根本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从而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一致。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教育入手，着重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问题，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既是整风的一项根本内容和目的，又是完成整风的全部任务的根本方法。这个根本的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是延安整风取得伟大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总结这一经验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把思想教育提到党的建设工作的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中心环节来认识和

对待，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它不仅对我们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而且对于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二

延安整风以前，我党反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除了上面指出的没有着重从根本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个原因以外，还有方法不对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从思想政治上建党，而只单纯着重组织处理，甚至对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样不但不能使干部了解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错误的办法，不能吸取经验教训，而且往往以一种错误倾向掩盖另一种错误倾向，使错误越来越大。王明路线对党的统治就是靠这种办法维持的。

鉴于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采取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或者说“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全党普遍整风的动员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后来，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他又进一步指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得到伟大成功，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团结，与采取这个方针有密切关系。

首先，实行这个方针有一个前提和基本出发点，那就是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相信广大党员群众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缺点和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⑤对党外群众是这样，对党内也是这样。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主要是一种思想矛盾和思想原则上的斗争，“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⑥思想斗争同别的斗争不同，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压服强制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说服教育、与人为善的态度，经过批评或斗争，分清是非，达到新的团结。共产党人不是无原则的“斗争家”，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为斗争而斗争，批评和斗争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通过批评或斗争，分清原则是非，提高思想觉悟，用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达到更好的团结，夺取革命的胜利。所以，开展批评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忘达到团结的目的，批评和斗争是否正确，是否恰当，归根结蒂看它是否能够达到真正的团结。在整风中间，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且尖锐地指出：“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⑦康生在整风中借口“抢救运动”大搞斗争扩大化，虽然使整风走了一点弯路，但很快被毛泽东等同志发现并予以纠正。由此可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要不是一个方法问题、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和根本态度问题。对党内问题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同志有没有团结的愿望，是贯彻这个方针的前提和关键。

但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并不是要取消思想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搞调和主义，当“老好人”。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⑧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分歧和矛盾，只要是带有某种原则性的，都有一个是非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不分是非，不开展批评和斗争，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是不利于团结的。这只能使分歧加剧，矛盾激化，破坏党的统一和团结。所以，正确地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方面要反对那种不从团结出发，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机械过火的斗争，另一方面也要反对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一团和气的自由主义态度。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曾把这个方针进一步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说这就是辩证法，是辩证法在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的应用，而与此相反的方法（无论是“左”的“斗争——斗争——斗争”，或右的“团结——团结——团结”）则是形而上学在党内斗争中的表现。

如同辩证法要以唯物论作基础那样，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也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就是说，开展批评或斗争，无论对人对己，都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不能以“左”反右或以右反右，也不能以右反“左”或以“左”反“左”。毛泽东同志对于王明时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就作了两方面的具体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⑨就是在策略问题如土地问题上，也要作两方面的分析，“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⑩这种分析，既区别了“延安”和“西安”，充分体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与人为善的态度，又符合实际情况，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采取这种态度，才使批评或斗争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在毛泽东同志确定的这种正确的方针方法和党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觉革命、自我改造的伟大学校。许多同志、特别是许多高级干部当时写的学习笔记和自我检查至今仍然感人至深，他们那种实事求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勇于自觉革命的精神，仍然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他们在党和人民中的威信不是降低而是更高了，从而我们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和形象也大大提高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过：“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从精神上来说，延安整风可以说就是全党“自觉地改造自己”的“共产主义时代”，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为光辉的和令人向往的时期之一。它的出现，同我们党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会了从思想教育入手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处理党内的矛盾，有极大的关系。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说过：“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⑪他这里指的主要是斯大林在处理党内矛盾问题上所犯的缺点错误。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继承了列宁的事业，沿着列宁指示的方向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但是他在处理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关系问题上犯过很大的错误，主要就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的这种错误，对各国党都有很大影响，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所采取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都同斯大林的影响有关系，而特别是王明搞的那一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⑫所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

结”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对斯大林的错误方针的一种抵制和纠正，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发展，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贡献。

后来，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得到了伟大的成功。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系统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时，又把这个方法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针和“公式”。经过四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考验，这个方针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它不仅对于整党，而且对于处理一切人民内部矛盾，都有重大意义。

三

始终抓紧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以推动和领导全党的整顿，是延安整风取得成功的关键一环。

我们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的纪律，党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党内的严重错误或错误路线，只有在多数同志、特别是多数高级干部不知其为错误甚至对它表示拥护的情况下，才能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如果党的领导核心的大多数同志，能够识别错误，起来反对错误路线，那末错误路线便不能形成，形成了也会被及早纠正。所以，错误路线之所以能够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全党的思想状况，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所以延安整风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然后又转到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上来，自始至终把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作为一个重点，务求提高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解决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和领导好全党的整风，真正达到全党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高度一致。

开始，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有120多名高级干部，其中核心有40多人。毛泽东同志在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讲话，系统地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原则和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揭露了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的办法。接着，1941年9月，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开展普遍整风问题。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了党的领导机关从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段历史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接着，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要求在延安和外地，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人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的干部，地方的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中央还把相当一批高级干部集中到中央党校脱产进行整风学习。

为了使高级干部提高思想觉悟，分清路线是非，除了规定学习若干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整风文件以外，毛泽东同志还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随后又编印了《六大以前》的历史材料，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经过了成功和失败的实践的检验，比较容易辨别。所以，从历史问题入手，研究和比较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比较容

易取得一致的认识。这比单纯从现实问题入手，或单纯从理论上提高，要更深刻也更有说服力一些，这是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方法，在延安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中也贯彻了这个方法，特别在整风运动的第三个阶段，即高级干部整风总结阶段，更是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为中心。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分清了，思想路线端正了，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提高了，现实的当前的路线是非也就比较容易分辨清楚。这样就可以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高度团结。

似乎可以说，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经过学习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达到对现实问题的一致认识；从政治路线问题出发，经过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端正思想路线，又达到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上的高度统一；从领导出发，经过全党的普遍整风学习，又达到领导水平的提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辩证法。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明确和制定以后，从组织上来说，抓住高级干部的整风，使之务必取得显著成效，则是整个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

今天，我们党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同延安整风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是我们党已夺取了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建国三十多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除了仍然要非常注意不断地解决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以外，还要非常注意继续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不断地使自己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从当前情况和一定意义上讲，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执政党建设的关键与核心问题。执政党的地位，领导的地位，比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各种歪风。陈云同志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有可能由于严重脱离群众、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执政党建设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我们不仅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提高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而且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民主集中制的党，这样才能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两个重大的基本问题，都是在延安时期不那么突出、因而没有着重加以解决的。我们这次全面整党，包括的内容多，涉及面广，情况和问题比在延安时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延安整风的经验和作法，我们要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创造性地运用和继承延安整风的经验，并对它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但不管怎样，延安整风中着重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顿，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始终抓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等基本经验，仍然是可以而且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注释：

①②③⑦⑨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9、1056、778、829、892、89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37页。

⑤⑪⑫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371、304、283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3页。